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57-74・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04

直面黨國權力：
回應項飈的「雨傘運動」論述

葉 蔭 聰*

摘 要

項飈教授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評論，是中國大陸學界一次難得的「民間嘗試」。然而，在項的香港論述裡，幾乎看不到中共在香港民主化裡的角色，以及香港與大陸政治發展分殊的歷史過程。而這一過程正源於中共在 1989 年暴力地壓制了黨內外的民主改革訴求及議程，並自 1990 年代開始強力推動國家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以取得領導權及正當性，這也是香港政治發展的所謂「缺失」的歷史。本文要進一步指出，項的香港論述源於他的當代中國敘事，這一套敘事迴避黨國權力在歷史上的重整，以及其實質的政經運作，相反，卻一頭栽進一種黨領導權的神話。項文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各種近年興起的中共黨國理論與神話，阻礙了中港兩地，甚至整個華人地區之間的政治及知性對話。

關鍵字：香港、雨傘運動、中共、新自由主義、民主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83 : 57-74 • 2015

Directly Facing Party-state Power: A Response to Xiang Biao's Discourse on Umbrella Movement

Iam-chong Ip *

ABSTRACT

Professor Xiang Biao's commentary on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is a rare attempt among academics in mainland China to discuss Hong Kong. However, in his discours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s democratization is almost invisibl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y which Hong Kong and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have increasingly diverged is not discussed. This process began in 1989 when the communist regime violently repressed the demands and agenda for democratic reform and continued in the 1990s as the state pushed forward neoliberalism in order to obtain 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It is also the history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Xiang's narra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which his discourse on Hong Kong is derived evades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state power reshuffles and its politico-economic operation in reality. In contrast, it embraces the myth of party-state leadership. Xiang's article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various theories and myth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y pose obstacles to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also among different Chinese societies.

Keywords: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oliberalism, democratiz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前　言

在香港有一個相當奇怪的情況：我們能接觸到的中國大陸學界對香港的論述，總是離不開北京政府的觀點與利益。例如，大陸法律界對香港基本法的詮釋，幾乎只有一種，盡是為了維護人大常委對香港《基本法》的詮釋，以及多番的釋法與補充，卻從沒有聽到那怕一丁點的異議，香港媒體及公眾會嘲弄這些法學權威為「護法」。其實，只要稍有涉獵大陸法學界，便會知道並不那麼一言堂，有許多爭議，但有關香港的爭議卻很少出現。至於社會科學界，例如社科院的《競爭力藍皮書》，又或者有香港與大陸學界合作的《香港藍皮書》，亦不出官方口徑。強世功教授對香港的論述算是一家之言，但他對北京官方的觀點亦只有確認與發展，並沒有多少批判與異議，畢竟他的香港研究，也是中聯辦邀聘他來進行長期研究才作始的，而 2014 年國務院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他亦有份參與撰寫。

在這種格局之下，只要香港出現與北京政府不一樣的立場，便好像反對整個中國，很容易馬上被打成「反中」，或被描繪成居心叵測的政客煽動群眾的「反中」情緒，對「一國」體制不認識，缺乏對國家的認同等等；嚴重者，甚至遭指為外國勢力的陰謀。以上這些負面標籤，都可以在北京政府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官方回應中找到，無論是針對戴耀廷提出的「佔中」行動，還是自九月至十二月間發生的雨傘佔運運動，細緻定性雖有變動，但走不出這個調子。

因此，項飈教授的〈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下簡稱為「項文」）實在值得期待，起碼其行文與立論，並非完全是北京官方口徑，其身份位置也是一位學者，算是一次「民間嘗試」。項教授雖然現在英國牛津大學教書，但他去英國唸博士以前，基本上接受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訓練，現在經常在華人地區出版著作及講學。我在讀博士課程期間，拜讀過他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大作，深受啟發。

項教授提出了要「直面這場運動」，直接理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而不把它視作某個理念的「直接化身」，也不把它視作國際陰謀。然而，沒有人可以不經過任何概念、框架去「直面」一場運動的，我感到有興趣的地方是，項文的香港論述中的概念與框架是甚麼，他是透過怎樣的眼鏡去「直面」運動呢？與其他香港論述有何分別？

作者大致勾劃了這場民主運動的近因與遠因。近因是環繞香港普選方案，北京政府對普選辦法作了多重限制，香港的泛民政黨、社運團體以及大概一半或甚至更多的市民反對，而特區政府應對運動的手法，例如逮捕示威組織者、出動大量胡椒噴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警棍及催淚彈，惹起更大的眾怒。至於後者，則來自政經、文化及日常生活上日益緊張的中港關係。

雨傘佔領運動剛過去，以其他形式進行的運動與爭議仍然繼續，要求任何學者馬上對運動事件作出系統性的學術解釋都是不切實際的，而項教授其實已做到了基本的新聞評述要求。因此，雖然我對運動的理解與項有不少差異，但我無意挑剔他對運動的解釋，事實上，我讀著項教授的文章，我發現他的企圖並不純粹是解釋這場運動。項只在文章的第一節以及第二節開首，大概文章的二分之一的篇幅，比較集中談及這場運動，其餘一半都透過論述香港民主化，闡述一個有關當代中國政治的分析架構。因此，我的評論也會聚焦在這方面。

香港論述：中共的消失

項有一個關於香港民主化性質的觀點，主導了他對香港以致雨傘運動的看法。他認為，香港民主化的歷史特徵是「外向性」。香港作為 1997 年前的英國殖民地，以及 1997 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認識香港以外的因素對她發生作用，幾乎是不需辯駁的常識。不過，項所指的「外向性」，並不止於此。他要指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是和中國的黨－國家體制形成的歷史沒有直接關聯」，它是與 1997 年以前，其殖民地地位所決定的「自主」而衍生的。然而，他很明顯在提倡在認識香港政治，以及思考其出路時，需要克服其「外向性」。

不妨先看他有關香港民主化進程的敘述。項的敘事起點是 1989 年：「外向性是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的一個歷史特徵。香港現在的民主政黨起源於 1990 年，是對大陸 1989 年的直接反應」，然後，他再談到 1992 年彭定康來港後的政改方案。這套論述令筆者感到奇怪的地方是：為何 1989 年前的歷史消失了？有關香港的政治發展雖然有多方爭論，但不管是香港的泛民主派還是北京政府也同意，香港的民主化是由 1980 年代初中英談判，以及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開始。因此，北京政府官員經常強調，香港民主化歸功於主權回歸，泛民主派則強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以至指責北京政府違反承諾。

這裡有必要論證 1980 年代這段歷史的重要性。1980 年代初以前，香港不能說完全沒有民主訴求，但大都停留在精英階層，完全談不上成為全民共識。例如二次結束後，1945 年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提出市議會改革方案，1960 年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馬文輝等人組黨參加市政局選舉。但是，基於各種原因，英國政府、殖民地部與港英殖民官員並沒有決心，再加上華人精英與民眾也對此不大支持，因此無疾而終（Tsang 1995；貝加爾 2014）。1967 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推行的也是社會政策改革，有學者認為，這段時期香港才孕育出香港社會「自成一體」的意識（呂大樂，2002[1997]; Ma 1999），但談不上一個政治社群。這也不難明白，因為，殖民地的行政及立法機關幾乎完全沒有改動，政治改革的可能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才有。

1980 年代初的香港政治前途問題談判，是首次讓民主改革及自治進入議程，而且是全港性的，亦是香港作為一個政治社群的開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社會從根本上被排除在談判與決策之外，除了英國政府之外，當年的中央政府扮演了主導角色。當香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於 1979 年首次訪華時，英國政府並不打算交出香港的管治權，相反，他是打算說服北京政府延續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的。結果，鄧小平決定「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實施「一國兩制」。不過，當時香港主流社會是想「維持現狀」的，支持「民族回歸，民主治港」的反而是少數，他們當中有傳統親北京陣營人士，亦有自 1970 年代已活躍的學運份子及青年社會改革家等。然而，當北京政府下定決心要「恢復」主權，而英國政府又不再打算與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爭持後，香港前途大定，維持香港殖民現狀的期望落空了。在鄧小平斬釘截鐵的主權立場之外，北京政府口號上打出回歸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呼應支持「民族回歸，民主治港」的少數。[1] 同時，中英雙方為安撫曾渴望「維持現狀」的訴求，所以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也提出「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及「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並在過渡期裡陸續大力吸納那些曾支持英國殖民統治的華資，如李嘉誠、李兆基等等，以及親英才俊，包括現任的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與譚惠珠。

故此，香港民主化進程的起點，是香港給兩個大國推進一個新的政治軌跡，亦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忽視 1980 年代的中國政府因素，它甚至影響了香港的泛民主派。1984 年後，許多在 1970 年代活躍的壓力團體及社運活躍份子，更積極地參政，包括區議會、市政局選舉等。另一個著名例子是香港泛民主派元老李柱銘，今天被人稱為香港「民主之父」。他在 1980 年代初，已經是香港精英階層代表，是大律師公會主席，他當時是支持「主權換治權」，維持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不過，在 1983 年左右，他便開始轉為支持回歸及「一國兩制」，他甚至在 1989 年前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會」）。不過，後來李柱銘像同是草委的司徒華，高調參與了支援 1989 年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京學運，譴責中共鎮壓學生，以及領導「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才被迫退出草委會，並於 1990 年組成香港民主同盟（一般被稱為首個政黨），即民主黨的前身。

因此，若遵從項教授的說法，香港民主化真的有其「外向性」，那麼，中央政府扮演了相當大的角色去觸成的，因為，英國政府與香港本地社會在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之前，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清晰全面的民主化議程。在我看來，把香港民主化視為「外」，只會造成誤解與誤導，尤其是掩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民主化裡的角色。

「缺失的」歷史

項的論述隱去 1980 年代初的北京政府角色，其中一個論述功能，是令香港所謂「沒有政治主體資格」、「政治性格的缺失」等變得好像是她的殖民過去決定了，跟中國政府與政治無關。項並沒有弄清楚，這種「缺失」的歷史脈絡，斷言香港的「政治性格」來自殖民過去，是過於武斷。其實，香港的歷史固然有獨特性，但亦兼具後殖民研究學者強調的殖民創傷性（traumatic）經驗，或霍爾所說的「內在剝奪」（inner expropriation），即被殖民者的身份認同本身，並不存在一個原初的歷史起點，而是一個又一個的被剝奪創傷。換言之，是被殖民改造，是破裂的創傷，是被建構的他者（other），當中總有殖民痕跡（Hall 1997[1990]: 52-53）。而香港被給予「自治」的身份、名份或主體的這段歷史，亦正是這個初生的社群身不由己的創傷性經驗。中英兩大國盤算、操控及交易，把香港改造，投進被設想成屬於她自己的「政治前途」——1997 前的過渡期及之後的回歸路，香港人亦只有抱著這被剝奪的創傷，探尋「自治」之路。

中共黨國消失在香港論述中，另一功能則是免去一段中共的尷尬歷史。1980 年代是中國蘊釀政治改革討論的春天，當時中國不單如火如荼地進行經濟改革，還在準備進行政治改革。1980 年，鄧小平已提出要政治體制改革，1986 年，在鄧小平的同意下，總理趙紫陽組織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及辦公室（吳國光，1997）。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讓香港在回歸路上開展政制改革及民主化，亦因為黨內外有政治改革的共識，這個短暫的共識，對香港來說雖然是外來的，但卻協助香港首次形成了自治及民主化共識。可是，1986-87 年，中共黨內保守力量發動「反自由化」運動以及引發學潮，令包括總書記胡耀邦在內的改革派受挫，間接導致 1989 年的北京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運及其政治訴求出現。然而，鄧小平及一眾保守官僚決定以軍事鎮壓挽救政治危機，並全面清洗支持政治改革的黨幹部，中斷了實質的政治改革進程（雖然口頭上仍然偶然提一下，例如幾年前的總理溫家寶）。因此，1990 年代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與毛時代是有所不同的，其歷史起點是暴力壓制黨內外的民主化訴求及議程，並把質疑中共主導的市場化計劃的社會力量打壓下去。然而，中共在 90 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化及新自由主義化中，卻靠著驚人的經濟增長，令自己的一黨專政取得了正當性，以及更大的「自信」（這一點容後再詳論）。

回過頭來看，香港的政治前途有幸有不幸。幸運的是，她搭上 1980 年代中國政治改革春天的尾班車，[2] 開展了她邁向「高度自治」之路，然而，卻在 1989 年後喪失了之前有利的中國政治條件，獨自面對一個否定民主改革的一黨專政體制。[3] 有點不可思議的是，香港沒有像中國大陸，依然沒有完全失去政改動力，[4] 不過，民主化面對的困難之大亦可以想像。

如果香港政治主體可以用「缺失」來形容，那麼，以上所說的就是「缺失」的歷史了。有趣的是，項指出「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是和中國的黨－國家體制形成的歷史沒有直接關聯」，這絕非事實，不過，若換上「1989 年後與中國民主發展逐漸脫勾」，則是準確的。但是，這個脫勾並非某種抽象的「歷史局限」，也不全因為香港曾是殖民地，而是中港政治關係之間有以上一段這樣的歷史，也因為中國體制內外的民主改革呼聲遭打壓的結果。

總的來看，在項的論述中，中共對香港的實際取態、政策及干預經常是不作論述的，或語焉不詳。[5] 於是，有時讀起來，讓人有一種感覺，認為項教授把所有問題歸為香港本身的「歷史局限」。而諷刺的是，這套「歷史局限」論是非歷史的。

事實上，項教授也注意到大談香港的民主化外向性，對理解香港近年的民主訴求其實沒有太大幫助，所以，也在論述中偶然提及中國與香港的政經關係。例如，他要解釋香港社會（尤其是泛民主派及其群眾）為何視普選為解決其他重要問題的出路時，提及「不少香港人認為，中央為了治港，支持、聯合香港的地產和金融資本，強化了社會不平等」，以及「中央政府 2003 年特別是 2013 年以來的政策愈來愈強硬」。可是，這些因素又如何併合到他所說的「外向性」呢？

首先，項教授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香港爭普選運動在三四年前，還沒有成為全民運動。我稍為搜尋過回歸以來有關爭取普選運動的報章報導，並發現普選訴求在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以前是動員不了多少人的。2003 年前，根據我找到的報導，相關抗議的參與者只有數百人；曾在 2003 年七一遊行動員了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的民陣，在之後數年的遊行裡，對加入普選訴求也相當審慎，怕會減少群眾上街意欲。2004 年，人大常委要在《基本法》規定之外，加入所謂「政改五步曲」，令特區政府要啟動政改，需要向人大常委交報告，並由它「確定」原則（即批評者所說的「對《基本法》的僭建」）。當時泛民政黨及團體只能發動一個出席者只有一二千人的集會（當晚即散去），事後採取堵塞政府總部行動抗議者只有一百人，警察翌日清晨把示威者抬走便了事。因此，普選運動成為扣連眾多訴求，牽動廣大群眾情緒，是近幾年的事。整個過程很複雜，大概是香港公民社會經過 2009-2010 年的反高鐵運動，令不少人感受到功能組別的無理，2010 年的「五區公投」也成為一次動員，而 2012 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也令不少感受到中共的政治壓力，自此之後，香港的政局發生了變化。

然而，運動的勢態不是組織者主觀創造的。過去香港社會對普選訴求缺乏興趣，固然與香港九七後的統治階層—即親北京的香港工商界、專業界、前港英政府公務員精英及傳統親北京政黨社團—勉強維持了香港管治有關，雖然當中不乏各種危機，但並沒有讓社會矛盾與力量聚焦在普選議題上。此外，泛民陣營以至整體社會對體制內改革抱有或多或少的期望，期待北京政府對普選的承諾，而沒有全力動員群眾製造對決的勢態。因此，項教授認為，香港外向性的另一層意思是指香港民主運動視「民主化可以通過對現行不夠民主的體制的否定，解決一系列問題，而相對不重視現行體制的內在機制和可能反彈」，然而，這恐怕是欠缺歷史分析的判斷。回歸十五年以來，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這場民主運動都是在「現行體制的內在機制」之中作談判與爭取，這也包括 2010 年，香港最大的泛民政黨民主黨，願意接受中共給予的 2012 年政改方案，以及接受有關 2017 年普選的口頭承諾（另有不接受的政黨則舉行「五區公投」）。可是，結果換回來的口頭承諾變了甚麼呢？就是去年人大常委會「八三一」的框架。

以上有關政改的發展，可以放在兩大政治背景去理解。第一為政治大環境，由回歸前的過渡期至今天，北京政府及其政治代理人，憑著政治及經濟資源的優勢，逐漸大量佔據香港政治與公民社會中的體制位置這個基本格局。而近年，甚至繞開本地的統治階層（例如所謂由大地產商控制的人士及高級政務官系統），進一步確立北京的治港班子。2012 年政務官出身的曾蔭權卸任，被疑為地下共產黨員的梁振英上台，此為重要分水嶺，梁在北京當局大致操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在最後階段突然壓過了得到本地大部分工商精英支持的唐英年。此番政治轉變，一般被解讀成北京治港政策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轉變，即由北京政府連同中聯辦欽點人選管治香港。同時，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人大常委領導，經常就香港事務頻繁發表評論，甚至被懷疑直接干預，例如操控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特別是 2003 年的國家安全法立法爭議之後，對政制改革的時間表與內容進行釋法及限定，以至 2012 年的國民教育爭議等等，都讓香港人愈發感受到來自北方的政治壓力。再加上親北京商人大肆收購香港媒體，並配合政府一直以來鼓勵寡頭壟斷的廣播政策，香港屢屢爆出媒體自我審查、開除有反對派背景的媒體人等情事，遂令香港的「言論自由」出現危機。因此，人大常委要「落閘」，限制 2017 年及之後的特首提名程序，香港社會很大一部份人的反應，以至泛民主派的觀感，便不單是口號中所說有違「國際標準」（政治平權原則與公平制度）所致的。

第二個背景，也就是項有稍為提及的經濟因素，但他只聚焦在香港 GDP 為中國城市超越所帶來的失落感，以及由此產生的「自救」及「逆反」心理。暫不論這個心理解釋是否合理，值得注意的是，他描述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膨脹和擴散過程，仿如一個「自然」過程，中國共產黨的推動角色卻被隱去。

香港經濟在八、九十年代加速了金融化及去工業化，形成中港兩地的國際分工。但 2000 年以來，香港金融業日漸依賴中國資本（例如股票市場超過一半來自中國國企）。而且，香港走出 1997-2003 年間的經濟衰退期，除了跟全球資本主義氣候的轉變有關外，亦相當程度仰賴大陸流出的資本及消費力。後者刺激了各類專業服務業、旅遊業、零售部門、文化創意產業等等的發展，甚至令投資需求主導的地產市場更熾熱。這些都與北京政府的經濟方針，以及其對港政策有關。例如，2003 年北京跟香港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自 2004 年放寬大陸居民到港簽證政策（即所謂「自由行」），刺激旅遊及零售業，這一切都是中央政府推動的。然而，中港融合的經濟繁榮也讓香港付出社會代價，尤其加劇香港房價的高漲，也帶來了城市空間急速的縉紳化及單一化，鄉郊土地的過度開發及帶來的破壞。跨境的旅遊與消費活動過度膨脹，擠壓著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及居住需要，體現在地鐵太過擁擠、社區小店消失、超量旅客與水貨客阻塞交通要道及街道等等。當然，並不是說所有惡果都應算到北京政府頭上，但是，要理解這個過程，中央政府的角色不能缺席。正如 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變化，這個黨國權力亦不能缺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論述：黨國權力的消失

我相信，項對香港民主化裡中共的角色語焉不詳，[6] 並非因為他不了解香港，而是因為他的香港論述源自他特有的當代中國敘事，以及敘事結構中一個相應的特點——黨國權力的實際運作成為一個不能論述或迴避的對象，然而，更弔詭的是，黨國權力又要支配這套敘事。

最明顯的是他用 1989 年北京學生運動來類比香港佔領運動，並指出當年學生的論述特點，而這個類比也與他如何理解香港雨傘運動有關，所以，我們不妨細讀一下他的評述。他指責參與八九年民動的學生的思想淺薄，迷信民主，沒有具體訴求提出，只要求個別領導人下台等等。他說：

> 參與運動的學生人人以為，一旦民主之光照臨，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人們基於社會主義正義、平等的觀念對當時強權下的市場化的質疑，在運動中則被表達為進一步擺脫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關於究竟如何民主化，則幾乎沒有任何具體設想，只是要求個別領導人下台。具體的社會矛盾被抽像地化約為民主的缺乏。

以上的描述或指控，與事實相距甚遠，甚至可以說是違背。當年學生由悼念胡耀邦階段，到「四二六」社論之後，至五月份絕食時，甚至到戒嚴令後，學生、知識份子及工人屢次提出多項頗為具體的政治及經濟改革訴求，絕大部份人皆沒有根本上「擺脫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可是，學生卻沒有得到合理的回應，在沒有任何行動升級下（不管學生訴求如何，由始至終皆是佔領廣場而矣），得到的卻是政府日益強硬的姿態，最終得到的更是軍事鎮壓。

而更莫名奇妙的是，項教授提出的三個「影響深遠的後果」：直接導致暴力性的全面鎮壓、民主夢破滅後全民下海及犬儒主義，以及 1992 年以後市場化高歌及經濟不平等，即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有關第一個後果，也許我們還能爭議一下是否因為學生沒有「見好就收」導致鎮壓（胡平 1992），但鎮壓學生的畢竟是中共，學生從來沒有武裝反抗，和平抗議令中共最後要以鎮壓來終結，這在邏輯及經驗上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並不那麼「直接導致」。在「導致」的問題上，項的「責備受害者」論述欠了讀者一個合理解釋。[7]

關於第二個後果，雖然我並不同意全民下海與犬儒主義是學生運動所帶來的，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限於篇幅這裡不作評議。至於第三個後果，則不得不說了。他的說法是運動對市場化沒有批判和反思，導致了 1992 年後的市場化後果。項提出 1992 年這個年份，他不可能不知道，正是這一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南巡」才是主因，可是他偏不說，卻說成為學生運動訴求淺薄的後果。1989 年六四鎮壓之後，西方國家經濟制裁中國，中共內部也出現是否要調整及甚至放棄改革開放，最後，由鄧小平等元老公開重新確認改革開放路線。因此，並不是學生運動導致 90 年代的市場化，而是中共。[8]

故此，難怪他對中共黨國權力的分析，是幾乎非政治化的。例如，他注意到香港與中國「愈行愈遠」，甚至他指出各方對「一國兩制」發展的軌跡落空了，但正如之前所說，他沒有指出殊途同歸的期望恰好來自 1980 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春天，他亦似乎不願意分析，在怎樣的歷史進程裡，共同的民主政治願景是怎樣破滅的。換一個說法，為何中共鎮壓提出民主訴求的北京學生，擱置了民主改革議程，反過來靠政府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手段，建立起對自己一黨專政體制的自信，包括過去十年對外吹捧「中國模式」呢？

項教授雖然不太願對這個黨國作歷史及政經分析，可是，他並沒有逃避論述黨國，相反，文章有一半以上，特別是最後一節「黨－國體制的變化？」，大量談論他對中共黨國的理解與論述。

黨的神話

項文最令人疑惑的是，文章最後一節大談「黨－國體制」的意圖。一方面，他對雨傘運動好像有些期待，期望「一時激起的革命性衝動轉化為持久性的進步社會力量」，可是，項在全篇文章也沒有多談「進步社會力量」是甚麼，尤其是當他那麼強調香港政局與中國大陸是分不開時（這一點在抽象層次上我是同意的），到底中國的社會力量如何？他卻全無論述。另一方面，他花了整整一節，超過文章的三分之一，大談「黨－國體制」，甚至在結尾處提出，「香港的困局，確實提出了中共應該如何爭取對國家的領導權的問題」。中共固然每天都在想領導權的問題，那麼，項是否建議我們也為他們多想一下？

只要對近年幾位被稱為「中國新左派」的論者有所認識，文章的最後一節並不難理解，基本上是他們的國家及黨國理論。項參考了汪暉及強世功的著作，[9] 突出了兩個他們認為的中國國家主權的特點，第一是指出中國是超越國家機器的主權象徵，並由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共產黨所扮演；第二，它是一個具有強大意識形態和政治自信的領導權。他並認為，這兩個特點也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主權能容納香港這個「次級政治主體」的兩個條件。

「中國新左派」的黨國論述，經常介於規範性說法與現狀描述之間，有時說的是關於「應該」，有時又是實然，是一個我們無法或不應繞過的「現狀」。然而，這套論述最大的問題是，超越國家機器的黨，這個主權象徵，究竟該怎樣跟國家機器區分？哪一樣是黨的，哪一樣是國家的？例如，項認為 1992 年以後的市場化帶來不平等、維穩劣行等等的是國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責任；至於關注弱勢、強調代表廣大群眾則是黨領導權體現。[10] 可是，既然全國上下的黨領導有任命領導（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等等）的權力，由地方到中央的領導都是黨員，八千多萬黨員、以及各級黨委與黨支部遍佈各級公家甚至民間機構，這黨與國如何區分？剛遭審查完畢移送司法機關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曾是中央政法委書記，也是維穩體系的總負責人，中紀委現在指他貪腐違紀違法，按照項的說法，究竟他是黨的一部份？還是國家的一部份？人大常委要保持香港的功能組別制度，讓本港工商及專業精英協助北京政府主導香港政局，以及捍衛香港資本主義，這是黨的領導權？還是所謂「國家化」？[11]

項毫無批判地引述及認同的這套理論，恐怕只是迴避黨國權力實質運作；面對「政治訴求的多樣化」及正當性危機時，發明一個想像中的「超越性黨領導權」，讓人逃進去一個黨的神話，並忽略或否定民間及地方上的政治主體的資格、正當性及政治可能。[12] 因此，這套理論也無法對香港的困局提出任何有意義的建言，甚至有違背常理的說法。

項在談到香港事務時說，「中央政府現在基本屬於失語狀態，無法把自己的政治主張，特別是具體的政策選擇，明確表達出來」，這個「中央政府」大概便是他說及想像出來的「超越性黨領導權」吧，那麼，為何人大常委把香港政制發展、政治地位以至制度框架設計都說得那麼一清二楚？國務院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難道又不是黨的語言？我的想法跟項剛剛相反，中央政府已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及具體政策選擇說得相當明白了，只是它得不到接近一半的香港市民同意吧。

不妨再舉一個例子，項把中共不參與香港選舉，不公開活動，解釋為領導權在香港的缺失，而把香港的困局理解為「確實提出了中共應該如何爭取國家的領導權的問題」。其實，不以中共之名參選，並不代表中共在香港沒有或無法爭取領導權，既有中聯辦地下及地上協調香港政務，也有親北京政黨社團參政與參選。相反，中共不參與

選舉，恰好是領導權的結構組成部份，也體現中共的特性。我們不妨想像兩個可能：如果中共在香港能像大陸那樣以其一黨專政方式「領導」，一國兩制便要結束了，在中國大陸，不要說是行政立法權力，就連司法也要受黨的政法委管；但是，如果中共直接在香港參與一場公開的選舉，從而取得領導權，那麼，對不能放棄一黨專政的中共來說，第一個難題是：如何保證這個政治領導權不會被輪替掉？這便是中共面對香港政治的問題核心，而且，中共不只要避免自己在香港的選舉被輪替掉，還擔心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不是自己認同的。這也是為甚麼人大常委要高度限制特首選舉的提名程序，保證候選人都是「愛國愛港」了。然而，這樣真的可以帶來政治穩定？雨傘佔領運動已否定了這個可能了。

解決之道還是問題本身？

正如我在文章開首所言，中港之間有著重重人為的區隔，雨傘佔領運動的限制，也正在於它無法穿越區隔。佔領運動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社會藍皮書》，書中指香港的「佔領行動」是今年內地網民關注的 20 大熱點輿情的第 2 位，但是，相關的「輿論引導工作較成功」，令它「未對內地局勢產生連鎖反應，也顯示內地政局穩定」。此番沾沾自喜之言，說明佔領運動無法令中央政府讓步（或升級打壓），連一丁點願意談判的姿態也迫不出來，這正在於中國黨國力量及「自信」：即使讓相關消息有限度在國內流通，也能成功引導輿論，選擇性地流通訊息，以及放大大陸與香港民眾的隔膜及敵意，從而「區隔」香港運動的影響力，令它不至於刺激大陸民眾對政治改革的關注（不著撰人 2014b）。[13] 項教授期望香港的這次運動能開啟一個新的政治過程，若這個政治過程也包括中國大陸，我可以肯定，他的期望要落空了。而令它落空的原因，當然可以怪責雨傘運動無法激動中國大陸的人心，甚至運動中的部份政治傾向對大陸人民並不友善，有所排拒。然而，最大的罪魁難道不是中共體制的「自信」工程，或這個所謂「具超越性」的黨嗎？

項教授的論述令我感到悲觀，不是因為他無力提供出路（我自問也是無力的），而是讓我看到，阻礙中港兩地（甚至包括台灣以內的整個華人地區之間）政治及知性對話的，不只是有形的障礙，還有種種近年興起的黨國理論與神話，它既迴避了中共在中國大陸，以至港澳地區的權力運作，迴避了被壓制多時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日程，那怕論者對運動有同情之心，亦於事無補。香港雨傘運動既不激進，也不偉大，也無法對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中國政治發展帶來甚麼契機。但有一點我是同意項教授的，「香港的問題不是她和大陸太不一樣，而是她以獨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國政治整體的深層矛盾」。簡單來說，香港人只是用一個中國其他地方無法運用的抗命方式，重提曾響徹全中國，甚至是中共黨內的民主改革呼聲。香港透過追求一個地方的自治，以及公平的政治制度，試圖限制鋪天蓋地的黨國權力，以及伴隨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經權力，進而讓政治正當性建立在程序正義與公民參與之上，其民主訴求較諸世界上不少民主運動，其實不是很有野心或很激進，同時，參與者大概也沒有想過程序公義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在實質成果上，運動至今依然無功。然而，我相信，佔領區裡每一個頭腦是清醒的，他們並不指望一個超越的黨領導權來解決中國又或者香港的問題。因為，這種想法不只是緣木求魚，還是造繭自縛，這個黨國領導權不是解決之道，反是問題本身之一。

如何讓中港兩地民間力量可以限制黨國政經權力，在體制內及外開展哪怕是一小步的中國民主改革議程，才是希望之所在。觀乎現今中國政局，這個希望還是很渺茫。

附　註

1. 後來，這句口號在 1990 年頒佈的《基本法》中再明文確認，並於第四章第四十五條明確指出要最終達至一人一票普選。
2. 澳門的政治前途、基本法制定及回歸等皆遲了香港兩年，所以，便搭不上這尾班車，以至澳門基本法內連終極普選的承諾也沒有。
3. 項可能會認為筆者把「專制」標籤簡單地貼在中共身上，但我這裡用「一黨專政」一詞，是源自中國憲法序言及總綱中強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人民主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2010 年十八大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所謂道路與制度，亦大概可用「一黨專政」來概括。同時，所謂「民主」，我也嘗試放在當代中國語境中論述，指出民主改革也曾是中共的政治議程。
4. 原因相當複雜，我也無力在此作出很確切及系統的解釋，大致原因是中共仍要堅持「一國兩制」，以及政改亦日漸成為香港政界以至民眾的共識。
5. 項在文章的一個註釋裡，有談及北京政府的政策失誤，導致香港主體性的缺失。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出兩點：第一，中共在建國初期沒有解放香港；第二，在香港殖民地晚期，亦反對英國政府的「去殖民化」，給予香港較大自主權和民主。我看不到第一點「解放香港」對香港政治主體性會帶來甚麼助益。而第二點，則說明中共一直以來的對港政策，故此，若說香港的自治艱難，自 1990 年代以來，最大的阻力是中共。同時，註釋提及的這一點，恐怕又難與項的內文觀點以及結論很好地結合起來，甚至互相矛盾。例如，若香港的問題，正好是中共要把握領導權所導致，又如何令它成為解決之道？

6. 有關中共在香港民主化裡的角色，項語焉不詳的地方實在太多，例如，他認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黨很難提高境界，成熟發展。究竟是指甚麼「目前的制度安排」？是誰的安排？除了北京政府一直強調的「行政主導」或近日「特首超然」論等，令香港政黨無法成為執政黨外，以立法會選舉制度為例，實行比例代表制是 1997 年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確立的，因應著 1995 年民主派在單議席單票制中取得相對多直選議席，比例代表制是要防止任何政黨成為議會裡的多數。不少人認為，這令新政黨不斷出現，以少量選票取得議席，令議會內力量分散，而泛民政黨亦只能永遠成為喊抗議與反對的黨，更不用說成為執政黨。至於一直保留的立法會功能組別（佔議席的一半），選舉委員會組成方式等等，便更不需多提了。

7. 他只在註釋裡引述鄒讜（1994）的見解，即「全能政治體制下協商機制的缺乏」，可是，這個全能政治體制是誰打造誰主導的？難道是學生嗎？

8. 關於中共的黨國體制，由中央至地方政府，如何扮演主動角色，推動中國新自由主義，相關的研究十分之多，例如 Harvey（2005）、Ong and Zhang（2008），可是，項偏只依賴汪暉的著作。項的文章多次提及鄧小平，卻竟然有意或無意遺漏了鄧晚年這麼重要的舉動，這實在只能解釋為他的黨國神話論述的癥候（symptom）。

9. 項在參考資料部份也提及葛兆光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0），不過，葛的著作與汪暉及強世功的十分不同，他的主旨是論述「中國」意識在歷史上的形成與轉變，而不是探究中國主權的政治正當性，他甚至很明確地反對把政治的正當性與歷史混在一起，也反對把政府或政權等同國家（葛兆光 2010：32-33），而把兩者等同卻恰好是強世功與汪暉寫作歷史的意圖。

10. 其實，要理解黨國的不同面向，根本無需虛構一個超越國家的黨，這個黨國合一的統治機器本來便是多面的。例如學者高柏（Bai Gao）曾用魔術方塊（Rubik's cub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形容中共黨國，他列出的何止是兩面？還是六個面向：威權主義、新自由、發展型、掠奪型、修正的社會主義及社團主義（corporatist），他認為，中共就是結合這六個面向，增強自己的國家能力，在全球化中掙扎，並排除民主化這個選項（Gao 2009）。

11. 北京人大常委副委員長李飛曾解釋，提名委員會要保留功能組別，的確是要特別照顧工商專業界，因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這些人雖是社會的少數，但卻有比較重的分量。而這種制度有利防範民粹主義，影響香港的自由港經濟地位及低稅制（不著撰人 2014a）。

12. 例如強世功的香港論述，相當大篇幅討論英國帝國（統治）技藝，以及詮釋中共主權的帝國、儒家特性與一國兩制的關係，卻極少細緻分析香港的泛民主派運動、組織與歷史，然而，他又輕易地貶之為「在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的中產精英（強世功 2008：37）。近年在中國（甚至部份西方）知識界裡相當大量流通的汪暉西藏論述，其中一個意圖便要強調西藏在中華帝國歷史中的位置，以及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在西藏的活動，從而否定西藏作為政治獨立的主體資格（汪暉 2010：118-135）。對強世功的批判，見陳冠中（2012）；對汪暉西藏論述的批判，見 Ip（2015）。

13. 筆者曾撰文指出，中央政府的各種措施手段，成功把香港雨傘運動區隔於大陸以外，令它就如明清時期的地方民變，難以觸及權力結構（葉蔭聰 2014）。

引用書目

不著撰人

2014a 〈李飛：提委會降政治對抗、民粹主義等三大風險〉。「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hkol/politics/2014-08/2690490.html，2015 年 9 月 23 日上線。

2014b 〈「佔領行動」內地網民關注大熱點〉。「成報網」，http://www.singpao.com/xw/gat/201412/t20141225_542585.html，2015 年 9 月 23 日上線。

呂大樂

2002 [1997] 〈自我一體的香港社會〉。刊於《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訂版）。吳俊雄、張志偉編，頁 668-67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貝加爾

2014 〈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思想香港》3：4-13。

吳國光

1997 《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台北：遠景。

汪暉

2010 《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胡平

1992 《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

2008 《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陳冠中

2012 《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項飈

2015 〈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考古人類學刊》83：5-24。DOI:10.6152/jaa.2015.12.0002。

葛兆光

2010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

葉蔭聰

2014 〈雨傘革命，香港民變〉。《明報》11 月 23 日：「星期日生活」。

鄒讜

1994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Gao, Bai

2009 The 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19: 409-438. DOI: 10.1108/S0277-2833(2009)0000019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ll, Stuart

1997[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Kathryn Woodward, ed. Pp. 51-59. London: Sage.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p, Iam-chong

2015 Agony over National-Imperial Identity Interpreting the Coloniality of the Chinese New Left. Cultural Dynamics 27: 241-252. DOI: 10.1177/0921374015585223.

Ma, Kit-wai Eric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Ong, Aihwa, and Li Zhang

2008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sang, Steve

1995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